

非洲非虚构文学:一种自我求索和发声方式

□余静远

非洲非虚构文学植根于非洲大陆悠久的口头传统之中。在殖民统治的阴影下,非洲非虚构作品展示出强烈的抗争精神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后殖民时代,自传和回忆录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非洲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特征。当代非洲非虚构文学的版图已经极大地扩展和丰富,呈现出非洲作家的多元探索和创新精神,数字媒体的兴起亦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非洲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学形式的激增,不仅反映了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摆脱殖民枷锁后,对于重塑历史叙事和文化身份的强烈渴望,更是一种从历史沉默中觉醒,夺回话语权的行动。在殖民统治下,非洲的故事往往被外部视角所扭曲,非洲人的主体性和生活的复杂性被忽视甚至抹杀。而后殖民时代的自传和回忆录,则为非洲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这一时期的非虚构作品,远不止是个人的叙述,它们是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织,是社会政治斗争的缩影,通过个人经历的棱镜,作家们折射出整个社群或国家的历史脉络和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诺奖作家沃尔·索因卡(1934-)的狱中日记《人死了:监狱笔记》(1972)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冷峻的笔触,描述了监狱的恶劣条件,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揭示了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的政治动荡,也映射着人性的光辉;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1930-2013)的评论作品《尼日利亚的问题》(1987)以其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分析,揭露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问题的根源,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的追求;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的自传《漫漫自由路》(1995)不仅是对他个人传奇生涯的记录,更是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斗争的深刻反思;肯尼亚作家恩吉·瓦·提安戈(1938-)的自传三部曲《战时梦》(2011)、《中学史》(2012)和《织梦人》(2016)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讲述了作家在肯尼亚的漫长历程,以及在政治斗争中的角色和转变。总而言之,非洲后殖民时期的非虚构文学,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是对整个非洲大陆在后殖民时期所遭遇的政治动荡、社会变迁、文化冲突和精神追求的集体记忆和反思。它们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记录了非洲人民在历史转折点的挣扎与抗争,痛苦与希望,以及对于自由、正义和身份认同的不懈追求。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它们丰富的叙事技巧、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上,更在于它们在促进社会变革和深化文化理解方面所发挥的积极贡献。

当代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多元发展

当代非洲非虚构文学的版图已经极大地扩展和丰富,涵盖了传记、游记、新闻作品、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展现了非洲作家在非虚构领域的多元探索和创新精神。这些作品不仅在形式上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深入探讨了非洲的社会现实、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其中,肯尼亚作家索因卡(1971-)、尼日利亚裔作家泰居·科尔(1975-)、尼日利亚裔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格齐·阿迪契(1977-)和南非作家特雷弗·诺亚(1984-)这些当代作家的非虚构作品,因其独特的声音、深刻的内容和对非虚构文学形式的贡献,在非洲大陆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广泛赞誉,也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国际化与多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索因卡、科尔的散文集《如何书写非洲》

(2008)以尖锐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直指西方媒体和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对非洲的刻板描述,发出了对更真实、更全面的非洲叙事的迫切呼声。在这部作品中,索因卡以讽刺的手法列举了一系列西方作家和记者在描述非洲时常用的陈词滥调,如将非洲描绘成一个充满野生动物、贫困和疾病的单一维度空间,忽视了非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这些错误和偏见不仅误导了公众对非洲的认识,而且对非洲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他呼吁作家和记者们摒弃对非洲的刻板印象,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的方式来描绘非洲的现实,提倡一种基于尊重和理解,能够体现非洲大陆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的叙述。在批判西方对非洲的错误描述之外,索因卡更是在与西方争夺非洲的自身叙事权。

索因卡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回忆录《有一天我会写下这个地方》(2012)则不仅是一份个人记忆的珍贵记录,更是一部描绘肯尼亚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生动画卷。索因卡在书中细腻地描绘了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肯尼亚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他通过对家庭关系和社群互动的深入探讨,展现了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探讨个人身份的构建时,索因卡并没有将其局限于个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他探讨了民族、文化、宗教和阶级等多重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索因卡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在肯尼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个人如何在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寻找和确认自己的位置。此外,索因卡的回忆录还触及了肯尼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如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等,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走向,也在个人层面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通过自己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大潮如何在个体的生命中掀起波澜,以及个人如何在这些动荡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和立场。

奇玛曼达·恩格齐·阿迪契的评论文章《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2012)源自于阿迪契在TED的演讲。在文章中,阿迪契分享了她个人在尼日利亚的成长经历,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现象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她如何逐渐意识到这些不平等对女性地位和机会的深远影响。她详细描绘了尼日利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印象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职业选择、教育机会和社会角色,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女性自我认同的形成。阿迪契强调,性别平等不仅对女性至关重要,它也是整个社会的福祉所系。她认为,追求性别平等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基石,它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让每个人都能在不受任何歧视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潜能。在对女权主义的正面定义中,阿迪契清晰地阐述了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和尊重。她纠正了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的误解和偏见,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女性权利的斗争,它同样关注男性的解放,致力于打破束缚所有人的性别刻板印象。阿迪契提倡的女权主义是一种包容性的运动,它追求的是性别角色的自由选择和对所有人的平等权利。

泰居·科尔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已知和奇怪

的事情》(2016)通过一系列散文、评论和游记,深入探讨了身份、移民以及本地与全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复杂议题。科尔以他作为尼日利亚移民和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审视了身份的流动性及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重构:他的文字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域之间,从纽约的街头摄影到非洲的故土记忆,从艺术评论到政治观察,科尔巧妙地将个人经历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相联系,让读者感受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科尔对移民主题的探讨从个人的迁徙经历扩展到了移民对文化、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的影响,揭示了移民在跨越地理和文化边界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在新环境中寻找归属感和平衡的艰难旅程;此外,科尔在探讨本地与全球关系时,展现了他对当代世界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他的游记和评论不仅记录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还探讨了全球化的影响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特雷弗·诺亚的回忆录《天生有罪:特雷弗·诺亚的变色人生》(2016)是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它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深刻的洞察力,不仅记录了诺亚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成长经历,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对南非社会历史和种族问题的深刻理解。诺亚通过自己的眼睛,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种族隔离及其后遗症对南非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和个人成长路径的深远影响,让我们看到了种族隔离政策如何将人们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以及这种划分如何影响了他和他的家庭。他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社会制度如何塑造和限制了个人的选择和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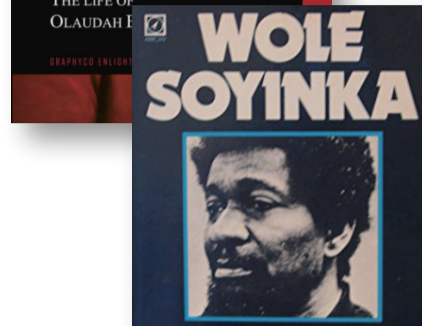
数字媒体时代的创新

数字媒体的兴起为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不仅为非洲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和传播平台,也极大地促进了非洲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合作。

例如,国外的写作博客平台如Medium和WordPress,为非洲作家提供了发表个人观点和故事的空间。阿迪契的文章《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最初就是通过TED的演讲在数字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在线杂志也为非洲作家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使得他们的作品能够迅速触及全球读者。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变得更加民主化。例如,索因卡最初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分享了其散文集《如何书写非洲》,随后作品迅速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对西方媒体和文学中对非洲刻板描述的广泛讨论。数字媒体的跨国特性也促进了非洲作家与国际文学界的对话。例如,特雷弗·诺亚的回忆录《天生有罪:特雷弗·诺亚的变色人生》通过数字平台获得了国际关注,他的YouTube频道和Twitter账号则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使他成为全球知名的非虚构文学作家。数字媒体提供的平台不仅扩大了非洲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也促进了体裁的创新和多样性。例如,互动叙事平台Electric South的VR短片,展示了非洲非虚构文学的新方向。这一类创新使得非洲非虚构文学更加多样化,同时也为



《奥洛阿德·埃奇亚诺生平奇事》



《人死了:监狱笔记》



《织梦人》



《如何书写非洲》



《已知和奇怪的事情》

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此外,数字媒体的自由度也使得非洲作家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题材和视角,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非洲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扎根于口头传统到在数字媒体中的当代表现形式,非洲非虚构文学经历了丰富而深刻的演变,这不仅反映了非洲大陆的不同经历,也展示了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坚韧与活力,这种演变不仅是文学创作形式的变迁,更是非洲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探索自我、寻求表达和发声的过程,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非虚构文学,不仅为非洲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反思和变革的有力工具,也使得非洲文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编辑)

汉学家苏独玉:中国民俗学国际传播的使者

□樊子琪

深入田野的学术探索

南开大学开启求学之旅。早在1983年,苏独玉就深入到中国青海省和甘肃省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当时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初期,西北地区的实地交通还没有那么便利,起初苏独玉的科研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幸运的是,苏独玉在兰州遇到了她汉学研究的“引路人”——兰州大学原中文系主任、著名民俗学家柯杨教授,由此开启了她对中国民俗学的长期探索。在柯杨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苏独玉深入研究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花儿”这一独特的音乐形式(“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由多民族创作的民歌形式,因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朵而得名,花儿的内容丰富,涵盖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多个方面,语言朴实鲜明,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作为汉学家,苏独玉有着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她不仅关注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和表现手法,更深入探讨其背后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民俗学、音乐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从多个角度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多年来,苏独玉始终致力于汉学研究,拥有多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就,她揭示了民俗学与音乐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窗口。也正是因为苏独玉卓越的学术工作,她的研究获得了多项奖金的支持,相信未来她会带给汉学研究界更多的惊喜。

社会得以从多维度观察一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文化中国。

搭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当前的中外文化互动中,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汉学家也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重要话事人。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观念意见,不仅促进了中外民间的相互理解与深度对话,更是为国际发展层面提供了更为专业、细致、科学的学术参考。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苏独玉这样的文化使者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苏教授一生致力于促进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共同发展提供学术基础。苏独玉教授是国际民俗学界少有的几位专攻中国民俗的学者之一,她在中国传统音乐民俗方面成就斐然,是国际民俗学界有名的“中国民俗学专家”,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和独到见解,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一名在民俗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苏独玉积极在全球高校进行访问讲学,向世界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多次开设讲座为国际社会普及中国民俗知识。同时她还在印第安纳大学开设多门中国民俗文化课程,修习过这些课程的青年学子不计其数,培养了无数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多年来她激发了大量西方青年前往中国学习深造,让他们

从此爱上中国,爱上汉学。在苏独玉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逐渐被西方社会所了解,她用民俗与音乐搭建起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用这种“接地气”的学术研究加强了文化共鸣,增进了相互理解,深化了情感联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力量。

作为当前国际知名的汉学家,苏独玉教授不仅是在民俗学领域颇有建树,更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她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鞭辟入里的学术著作作为国际社会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形象。苏教授的工作早已超越了学术的范畴,她更像是一名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用自己的学术生涯为全世界提供深入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机会。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对话和理解。时至今日,苏独玉依旧在中国这片文化多样性的田野上耕耘,为中国民俗研究、全球文化的交流与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



中国文学在海外



苏独玉(Sue Tuohy)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的杰出学者,多年来苏教授致力于中国民俗学研究,是享誉世界的汉学研究者。她出版了多部汉学研究专著,例如《采花·定义流派:张亚雄与花儿民歌选集》《文化隐喻与推理:当代中国的民俗研究与意识形态》等等,这些作品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展开的“严肃”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研究不同,苏教授关注的领域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这使她的学术成果受到更多学者,甚至是普罗大众的关注。得益于独树一帜的汉学学术面向,苏独玉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更亲近、更开放的学者角色。

汉学之旅的起点

与很多汉学家的经历相似,早期苏独玉被中国古老的语言与璀璨的文明吸引。基于这种强烈的文化兴趣,颇具“行动力”的苏独玉前往中国